

三种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

——以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与实践为例

李建新

【内容摘要】 关于人口问题的认识以及相关解决人口问题之道历来有三种立场和观点。三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产生了三种解决人口问题之道,这就是西方学者总结的“减少刀叉派”(即马尔萨斯主义主张)、“增大馅饼派”(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和“制度改进派”(结构主义主张)。本文检视和回顾了 20 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之道,指出在新形势下,“三派”合一认识是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 人口控制;“革命加生产”;“三派”合一

【作者简介】 李建新,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邮编:100871

1 引言

自二百多年前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把人口(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以来,关于人口问题的认识以及相关解决人口问题之道就争论不休。在以往和当代的论争中,主要有三种立场和观点:第一种是以新老马尔萨斯主义为代表,坚持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人类贫困和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问题而可能是进步的一个原因,因为历史纪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利就会提高;第三种是以结构主义为代表,认为人类贫困和苦难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制度和经济安排的运作引起的(哈珀,1998)。正因为对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所以,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解决人口问题之道,这就是西方学者总结的“减少刀叉派”(即马尔萨斯主义主张)、“增大馅饼派”(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和“制度改进派”(结构主义主张)。纵观 20 世纪中国人口变迁的历史,围绕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充满了激烈的争论,而解决人口问题之路也充满了艰难和曲折。即使 21 世纪的今天,这种论争也还余音袅袅,欲罢不甘。重新检视和回顾 20 世纪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实践,相信在新世纪里会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产生积极的影响。

2 马尔萨斯主义与控制人口

即便是今天,当我们把马尔萨斯主义与中国人口控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依然会有不少人心有余悸。但是,当抛弃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化的批判而回归到学术领域的时候,不难发现,马尔萨斯在论述人口与生存资料的不协调关系中,强调了人口快速增长的主导作用,主张控制人口以平衡协调这种关系,不能认为这种学说和主张是毫无科学价值的。在当今的人口研究中,谁也不否认,要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人口要素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以及其它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事实上,无论是国外的人口学研究,还是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和实践,都或多或少从马尔萨斯那里获得了借鉴,汲取了营养。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创立时,就曾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做过较高的评价。

从马尔萨斯学派主张节育、主张控制人口的视角分析,20 世纪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在学术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全面接受和认同马尔萨斯理论;建立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新人口论;确立“两种生

产理论’并指导计划生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还处在列强欺凌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一批批仁人志士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各种思想和思潮也被介绍到中国,而马尔萨斯《人口论》就是其中之一。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继承,当推中国学者陈长衡。1918年,陈长衡出版了《中国人口论》,这是一本最早论及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1934年,许仕廉出版《中国人口问题》,1934年陈达出版《人口问题》,他们都认为中国人口过剩,积极主张节育。陈长衡更是认为,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是人口问题。因此,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就是解决人口问题,而解决人口问题,不能靠革命,只能靠节育(查瑞传,1999)。可以说,陈长衡是旧中国时代积极主张以马尔萨斯主义为武器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代表人物。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马尔萨斯人口救国论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和平建设时期,在新中国消灭了各种不平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之后,中国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6亿,而在其后几年中,人口增长率都在2%以上。面对这种人口增长过快的现实,过去就曾关注过中国人口问题的马寅初先生通过多次深入实际调查,认识到中国人口多、资金少是阻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矛盾。1957年7月,马寅初发表了其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认为,新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过快增长既不是马尔萨斯资本主义时代所说的人口贫困问题,也不是当时苏联老大哥所断言的社会主义人口增长规律的表现,而是新社会新中国面临的特有的具体的中国人口问题。在其《新人口论》中,马寅初从经济建设资金积累、就业、教育普及、科技水平提高、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论证了人口过快增长所引起的矛盾,论证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必要性。马寅初认识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加快我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与马尔萨斯主义鼓吹节育控制人口是解决人类苦难的充分条件有所不同。虽然,马寅初新人口论在立论、目的上与马尔萨斯主义完全不同,完全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中国具体人口问题结合的产物。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还是遭到了厄运。随着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彻底批判,刚刚开始的控制中国人口的实践也随之化为泡影。马寅初新人口论在当时为何受到一边倒的批判也成为了后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悬念。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快速的人口增长引起了中国最高层领导强烈关注,于是一场没有任何理论上争论的“人口革命”——计划生育实践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计划生育深入蓬勃开展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为计划生育实践寻找理论基础和理论保障。但是这种寻求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里无法摆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马克思人口论的对立,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人口问题;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又不敢接受已被批判的马寅初人口论的研究成果。由于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学者们都试图从马恩列斯的原著中寻找理论依据。但在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论著中,除了有关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论述外,没有具体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理论的论述。与中国计划生育实践有关的论述只零星地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如“两种生产”、“共产主义社会将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平反,人口学学者才突破思想禁区,终于形成了两种生产理论的概括,形成了中国人口理论体系,并使之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然而,“两种生产理论”毕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建立的,其诞生本身就有着先天不足之处。这一点在后来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们对人口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之后显得更加突出。

其实,马寅初新人口论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笔者以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从严谨的学术研究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抓住了社会主义新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矛盾。正因为这样,面对众多的学术批判和政治压力,马寅初才义正辞严地指出:“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们投降”。他认为那些“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马寅初,

1998)。马老对那些只扣帽子、只打棍子、只破不立的批判表示极大的蔑视。他坚信从中国特殊的人口问题出发所建立的新人口理论是正确的。因此,无论对何种政治压力,马寅初都始终坚持学术真理,维护学术尊严。正是马寅初学术上的洞见和人格上的魅力,所以深受后人景仰和怀念。

3 马克思人口观与“革命加生产”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马尔萨斯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自然规律”出发,推论出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是人口绝对过剩,因此,失业、贫困和饥饿是必然的,是人口增长过快造成的。从而,回应了同时代葛德文、孔多塞对私有制的抨击。马尔萨斯的观点一出现便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争论。半个多世纪以后,1867年,马克思在其宏大巨著《资本论》中,以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规律。同时,对马尔萨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深刻揭露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马克思,1974)。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所谓的贫困、失业、不平等不是人口增长过快而引起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所以,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苦难,形成了与马尔萨斯人口观截然对立的人口观。马克思是早期主张以制度变革来解决人类苦难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初期,当马尔萨斯《人口论》被中国一些学者传播和接受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随着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传入中国。当陈长衡等积极主张以马尔萨斯主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时候,李大钊、陈独秀等就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人口观。他们都认为,人口问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只有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人口及其引带的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查瑞传,1999)。可以说,在人口问题上,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一落地,就有马克思主义与之针锋相对。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就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依据,断言:因为“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言下之意,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不例外会碰到人口吃饭问题,也会因为解决不了人口过多,而会不断引发革命。针对艾奇逊这种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在1949年8月发表的著名《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毛泽东乐观地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者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的干干净净,而且也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毛泽东,1991)。毛泽东又提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1991)。对中国人口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革命加生产”论断,也就是说,要解决旧中国的人口问题,要改变旧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首要的是打破半封建半殖民的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然后积极发展生产。很显然,在毛泽东这篇论著中,体现了两种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其一是制度变革,其二是发展经济。因此,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理解毛泽东上述充满革命激情充满革命乐观的,针对艾奇逊人口悲观论的论断,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实际上,中国革命成功本身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胜利和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破产。

然而,不幸的是,当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当马寅初针对中国人口新形势提出新人口论的时候,他的对手们却以所谓的马克思人口观以及上述毛泽东的论断将马寅初划入马尔萨斯阵营。这也使得后来

不少学者不作特定的历史分析,对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产生误读,误以为毛泽东的这些人口论述使中国人口问题步入困境。当我们再一次检视马寅初被批判的历史背景时,有两个层面上的原因是不能忽视的。其一是历史层面上的原因。正如上述所言,马尔萨斯人口论自诞生到传入中国,其对立面一直是马克思人口论,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人口观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思想。人口问题之争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之下,任何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思想或主张都会受到排斥和批判。因此,尽管马寅初提出其人口论时,明确地与马尔萨斯主义划清界线,但还是会被教条主义们轻而易举地划入“黑名单”;其二是现实层面上的原因。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以后,国际环境迫使我们继续保持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警惕和敏感;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建国初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进一步证实“革命加生产”的正确论断。而“大跃进”浮夸风的“宏伟业绩”更成为不少人批判马寅初的“有力证据”。可以看出,马寅初新人口论实际上被两股力量所“批倒”,第一种是源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制度变革;第二种来自于“增大馅饼”的“人手论”。不过,自第一种观点意识形态和政治化以后,其“杀伤力”更强。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学术领域,马寅初新人口论都不占任何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寅初理论生不逢时,是历史的悲剧。

“大跃进”宏伟蓝图的彻底破灭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无情地宣告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失误,也昭示着我国人口问题的存在和严重,1962年开始,中央又开始重新提倡节育,于是一场计划生育在中国部分地区悄然展开。不幸的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之中断。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由于意识形态、政治路线斗争不断,所以不仅大大地延误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了我代末80年代初,步步紧逼的生育政策显露出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的肤浅和解决问题的急于求成。在严厉的生育政策受阻后,人们开始认真地审视这种单纯“减少刀叉”法的有效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开罗国际人口大会的召开,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本、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等理念和人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这样,一方面,经济不发展影响了“馅饼的继续增大”;另一方面,人口增长的放任自流,使得吃“馅饼的刀叉”越来越多。中国人口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人口压力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初期,严峻的人口现实使中央最高层终于意识到,控制人口“减少刀叉”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这样,计划生育也就顺理成章轰轰烈烈地推向了全国。

从20世纪70年代起,计划生育成为我们解决人口问题毋庸置疑至高无上的选择,20世纪70年观点被学者所广泛接受,人们也开始以大人人口观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制度结构改进派也再次复苏。1994年,一直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盖尔·约翰逊撰文指出,为克服现行政策的缺陷,政府可以出台一组替代政策和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1)农民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2)有适宜的社会保障体系;3)明显地提高农村的受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4)更加迅速的城市化。约翰逊认为,制度结构的改进将会更有效地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约翰逊,1994)。

4 新古典经济学派与“发展是硬道理”

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制度派论战的同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就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持批判态度。在马歇尔所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其经济在发展,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而人口增长放缓并未出现如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速度。在这种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人口较快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而人口减少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与传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截然不同。20世纪后半叶,以西蒙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回应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如埃里奇“人口爆炸”论、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时,认为现代马尔萨斯论者忽略了市场能将人口、资源和环境调整到平衡的角色。人口增长不仅不是问题的原因,而且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是同财富、人类健康一同增加的(哈珀,1998)。

正如上节所分析,20世纪50年代末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判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来自意识形态的

纷争,还来自人口增长促进生产发展的乐观“人手”论。而“人口”(一张嘴)与“人手”(两只手)之争在1958、1959年之交达到了高潮。1958年,当时我党最高理论杂志《红旗》在其9月号发表的社论“大踏步前进的九年”中指出:“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促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愈快地促使国家的物产丰富、兴旺强盛,就能愈快地促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优裕、文化提高,这就是被伟大的九年所充分证实了的结论”(《红旗》社论,1958)。在1959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思想评论“人口和人手”中指出:“六亿多双手联合起来,那也等于一双开天辟地的巨手,生产得也很多。”现在,我国要大大发展工业生产,大大发展农业生产,还要大大发展文化科学事业,深深感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若水,1959)。可以想见,在那种到处热火朝天,大干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与马尔萨斯悲观论相联的主张控制人口的马寅初新人口论显然没有生存的市场,最终无法摆脱被“批倒”的历史宿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现代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都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乐观的“人手”没有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反而变成了沉重的“人口”压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崭新的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8%以上,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缓解了我国人口生存压力;另一方面,也使我国拥有第一大劳力资源的人口释放出了其“人手”和“人脑”的力量,生产和创造出了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人口与发展步入了正循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问题的本质就是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在研究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世界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后得出结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增长率的降低,即使在世界人口达到并超过了60亿之后也没有发生。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较长的时期内,人口的增长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知识的增加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与200年前或更早时期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不同”(盖尔·约翰逊,2000)。他不认为如果中国人口数量比现在少10%~20%或更少(如50%),中国的人均收入会有所增加。他认为,“对任何国家来说,人口都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财富,比自然资源和已有资本总量都重要得多。”(同上)事实上,中国经济建设巨大成就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经济、政治体制(制度)的变革。诚如美国制度学派大师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诺斯,1994)。我国建国50多年特别是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在制度创新下,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潜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人手”、“人脑”的充分发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而经济的不断发展,“馅饼的不断作大”又成为缓解人口压力、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之道。

5 “三派”合一——中国人口问题解决之道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4年世界人口发展大会召开以后,“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和接受。与此同时,人们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以“大人口观”认识我国人口问题,以“三派”合流来解决人口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共识。控制人口数量、搞计划生育,是遏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以减轻对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压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增大馅饼”创造更多的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制度结构改进,是强调分配公平、消除贫困以实现人类共同富裕。这些共识在我国政府2000年12月发表的《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白皮书上,我国明确地制定了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等。不过,这些共识达成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自动解决,在现实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

笔者以为还必须处理好以下两种关系。

其一,控制人口“减少刀叉”与发展经济“增大馅饼”之关系。20世纪70年代自计划生育成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法宝”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只关注如何尽快“减少刀叉”以解决沉重的人口负担。忽略了人口作为“人手”和“人脑”积极的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世界上最好的发展条件,即人口条件。只要我们努力发展教育和科研(培养人才人脑),逐步进入高科技领域;同时又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发挥人手人力),我们就能获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增长(樊纲,2002)。所以,我们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既定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优势;其次,更要关注和重视的是,怎样尽可能地把我们已经拥有的比较优势(人手)和潜在的人力资本(人脑)发挥出来,做出更大的“馅饼”,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仅仅只想“减少刀叉”、“减少人口”。其二,控制人口“减少刀叉”与制度结构“改进”之关系。过去我们曾一度把这一关系对立或忽视。正如上文所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少学者就是认为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不存在控制人口问题,制度变迁可以解决人口问题;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之后,人们又忽略制度“改进”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人口依然有70%左右是农村人口,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人口问题。农村人口问题很大程度上又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生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农村人口问题已不再仅仅是少生孩子控制人口数量的问题,更是个“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症结很大程度上是现行不合理制度造成的。因此,解决农村人口问题,还必须充分重视不合理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这些制度变迁包括逐步打破城乡壁垒、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免费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农村生殖健康服务。显然,这些制度的改进不仅可以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能让农民享受到更多改革进步的成果,促进社会稳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在广大农村地区,制度结构“改进”是我们解决人口问题不可忽视的有力举措。

总之,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形势、社会经济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那种单纯的、狭义的人口观以及解决人口问题之道已不合时宜。在新形势下,“三派合一”特别是发展经济、调整改进制度结构将是我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 1 【美】查尔斯·哈珀.肖晨阳等译.环境与社会.天津社会出版社,1998:201、203
- 2 查瑞传.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23、38
- 3 马寅初.新人口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5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831~832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511~1512
- 6 D.盖尔·约翰逊.中国现行制度和政策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1994:4
- 7 D.盖尔·约翰逊.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中国人口科学,2000:5
- 8 道格拉斯·C·诺斯.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144
- 9 樊纲.发展的道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10 社论.大踏步前进的九年.红旗,1958:9
- 11 若水.人口与人手.人民日报.1959-04-15